

二十六年的蘇聯與中國

大連日報社翻印

目錄

- 二十六年的蘇聯與中國 一三〇
附 錄 :

一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全文 三一四六

二 遠東持久和平的基石

——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四七十四九

二十六年的蘇聯與中國

解放日報

十月革命與東方的覺醒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最重要的有下列三點：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爲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下解放的一個整個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真正的道路，而大大促進了西方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它们吸引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的共同軌道上來；第三、因此它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征服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從西方的無產者起，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的被壓迫民族止，建築另一條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史大林「十月革命一週年紀念」論民族問題，解放社版）

「五四」運動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

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黨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時是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份人的統一戰線革命運動，它的弱點就在只限於知識份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發展到「六三」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份子，而有擴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了。「五四」運動的文化革命，則是澈底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澈底的文化革命。……「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與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與北伐戰爭。（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十月革命的成功，爲人類歷史立下了一個新時代的基礎，並爲蘇聯人民和偉大的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劃開了一個新時期。

十月革命對於中國優秀的和積極愛國的人們的巨大影響，可以從下面的事件看出來：當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大會時，那些可紀念的日子，孫中山先生進入會議廳，登上講臺，向大會報告人類的可怕的喪失：列寧之死，剛才得到的消息，這位老革命家顯然被這哀痛的消息感動了，整個會場陷於死般的靜寂。

「列寧」，孫中山先生說，「是一個倡導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偉大人物，是指出一

解放的新路的人。」

……我們不能忽視這件事實，即我們的革命從開始存在的某些日子，便給予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鬪爭以巨大的幫助，蘇聯對於中國的友好政策，不能不喚起中國人民對於蘇維埃國家最溫暖的同情，蘇維埃政權在一九一七年八月所發的最初一道命令，宣佈了民族自決的先例，並廢棄了舊日沙皇政府的掠奪政策，告訴中國人民新的俄羅斯和沙皇的專制政體是根本不同的。……

在蘇聯存在的二十五年間，這一貫地方針對中國的友好政策，不只一次地證明了蘇聯人民對於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所懷抱的溫暖同情。（蘇聯情報部一九四二年十月革命節梁純夫編譯「二十五年的蘇聯」所引，中蘇文化協會編譯委員會發行）

一九一九年蘇聯第一次對華宣言

中國國民、西南政府及北京政府：

……現在勞農政府人民委員會拿親愛的話對中國國民說：勞農政府底俄國和紅旗軍，經兩年底戰爭，耗無量精力，越過烏拉嶺，進至遠東，以表現其勝利的精神，在西伯利亞的人民，都曉得我們的真意所在，我們的真意是在拯救人民，脫離武力主義和外國

金錢的束縛，得着自由，使其不因受外國金錢壓迫，流爲外人的奴隸，在東方人民的當中，中國人民實在是佔一個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們不單是援助俄國的工人，並且要援助中國的人民，我們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後，所繼續不斷以通告中國人民的，常常被歐、美、日本等國的人隱秘起來，不經中國人民曉得，所以現在希望中國人民格外注意我們的說話。

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之後，勞農政府就取得大權，用俄國人民的名義，通告各國，表示願訂永久和平的意思，並且說：這種和平底基礎，應由各國彼此歸還從前所侵略的土地和賠款，不問國的大小，以及說：各國對內應該自主，各國對工人農人不得以勢力來壓制使他們不能上進，並且聲明，凡從前與日本、中國、及協約國所訂的密約，一律取消。因爲這種密約，僅僅供給從前俄皇和協約國政府壓制剝削人民，尤其壓制剝削中國的人民，僅僅是他們資本家和俄國軍閥的私人利益的緣故。

勞農政府曾經向中國提議磋商廢止一八九六年的中俄密約，一九〇一年北京和約（即庚子條約），以及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和日本所訂的協約，把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所取於中國的以及取於中國又轉讓予日本及協約國的，一概送還中國。我國所磋商的，一直等到一九一八年五月，協約國就壓迫中國政府和重賄中國的官吏與報紙，使中

國政府和勞農政府斷絕往來。而日本和協約國當這個時候，非特不將俄羅斯滿洲鐵路交還中國，反因利乘便，據為已有，並且強迫中國軍隊援助他們這種強盜行爲，因此中國的工人農人對於歐美日本各國的軍隊的攻入西伯利亞及滿洲，不但不知道他們所依據的理由，並且不知道是不是事實。

我們到現在特地將這個通告送給中國人民，使大家可以放開眼睛看看，免得再受他們的蒙蔽。凡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在中國、滿洲以及別處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棄。在那塊土地上的人民，願意成那樣的國，採取那種的政權，一任人民底自由選擇。

勞農政府把中東鐵路礦產林產等權利，及其他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克倫斯基政府、土北霍爾瓦特、謝米諾夫、和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取得的特權，都發還給中國，不取何種報酬。

勞農政府並拋棄庚子賠款，我們對於這一層所以不惜再三提議的，因為聽說這一項賠款我們已經聲明放棄，而中國政府及拿來供養從前俄羅斯帝國駐在北京的公使和駐在中國各地方底俄羅斯帝國的領事，現在任命這種公使和領事底政府早就消滅，而從前被任命的公使和領事居然得日本和協約國的援助，及安居在中國，天天在那裏欺蒙中國人

民，中國人民應該明白這件事，驅逐這班騙子出境。

凡俄國從前所獲取底各種特權，以及俄國商人在中國內地所設的工廠，俄國官員或牧師或委員等所有不受中國法庭底審判等特權，都一律放棄。

凡其他各種問題為向來日本協約國俄羅斯帝國政府對於中國所施底暴亂而且不合正義的行為，都應該從此盡行芟除。

勞農政府現在曉得日本與協約國以我們的軍隊，天天向西伯利亞前進，援救西伯利亞的農民工人，脫離土匪柯爾恰克及柯氏底黨徒和日本底壓制，他們深恐中國人民聽到這種消息，所以他們百計設法，務必使我們的話傳不到中國人民的耳朵裡。如果中國人民因為我們的提議願意做一種自由的人民，而免除巴黎和約所陷中國於朝鮮印度第二惡運，那麼深望中國人民和俄國農民工人及紅旗軍相提攜，為自由而戰！

現在勞農政府向中國國民提議，正式恢復兩國人民的友誼，並且請就派代表到俄國軍隊來。署名者勞農政府外交委員加拉罕，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見「新青年」七卷六號附錄第二頁）

當時（正值「五四」以後不久）中國各團體致蘇聯表示誠懇感謝的覆文者計有：全國各界聯合會、全國報界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各界聯合會、寧波同鄉會、上海

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國會議員（全體署名），杭州學生聯合會，中華商界救國總團，中華勞動公會，上海學生聯合會等十七團體，中華救國十人團聯合會，中華實業協會，旅滬四川同鄉會，四川旅滬聯合會等；表示感謝蘇聯援助及督促政府覺悟的報紙計有：天津益世報，上海時事新報，上海救國日報，上海學生聯合會日報，上海星期評論，上海正報，上海民國日報，北京晨報等。

天津益世報社論稱：「此實爲世界人類從來未有之義舉，苟非實行其防止人類掠奪人類之根本主義而出於自動之行爲，（缺四十六字）當局如何答覆，姑置不論，記者以爲國民對之必宜有所表示，本報請首先代表國民對於勞農政府之宣言表示接受。」

上海民國日報社論稱：「這個通告傳到中國以來，中國的人民團體言論機關凡有血性的都是很誠懇有力的表示接受。」

把各團體各報紙的言論結合起來，主要的意思分爲五項：（一）認識俄國此次的舉動是世界有史以來爲全人類圖幸福的空前創舉；（二）主張對於俄國人民及俄國所表現正義表示美滿的謝意，（三）准據勞農政府的通牒，收回一切勞農政府歸還的權利；（四）否認俄羅斯帝國時代及克倫斯基政府時代所派來中國的官吏，正式與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修好；（五）與俄國國民提携，致力於廢除國際的壓迫及國家的、種族的、階級的

差別。(以上均據「新青年」七卷六號附錄)

當時中國一般人士接到這宣言，雖然很歡喜，全國的青年學生更是對俄國因此發生無限的仰慕，但是當時的北京政府則在「協約國的一致行動之下」，……對於這個宣言，始終置之不理。(何漢文「中俄外交史」第三一八頁中華書局版。)

優林等來華與蘇聯第一次對華宣言

一九二〇年四月三日，蘇聯政府送來通牒，聲明放棄在華一切權利。同月二十九日，北京政府通電否認蘇俄政府通牒。八月二十六日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抵北京。(「中俄外交史」附編中俄外交關係大事年表)

蘇維埃政府根據一九一九年七月發表的宣言，進行和中國談判，於一九二〇年特派優林來華，進行促進中蘇外交關係的活動。不意那時北洋軍閥，正在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壓迫革命運動，對於談判，毫無誠意，徒使優林在北京住了半年，毫無結果而去。(秦傳川：「社會主義的蘇聯」第二三二頁民族革命出版社版)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蘇聯又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要點如下：

(一)聲明中，俄原有各種條約概為無效，俄國在中國之租借地概行退還，帝俄政府

及俄國資產階級黨在中國所侵奪竊取之權利，一併永遠無償退還中國。

(二)兩共和國立卽設法建設有秩序之貿易及經濟關係，然後訂立專約，雙方遵守最惠國待遇之條款。

(三)所有俄國反對革命黨之各機關、各團體、各個人，中國政府應不予以援助，並不准其在中國領土內有所活動，在中國領土內所有白俄之軍隊，中國應速除其武裝，並引渡於蘇俄政府。

(四)旅華俄僑應遵守中華民國一切法令。不能享有治外法權。

(五)凡在中國自稱俄國外交代表或領事，未有勞農政府之委任狀者，中國政府應即斷絕關係，並驅逐出華境。

(六)在中國政府不撥款付予俄國反動派的條件下，蘇俄政府放棄庚子賠款。

(七)兩國互派外交代表及領事。

(八)關於中東路問題，兩國另訂專約。(據「中俄外交史」三一八頁)

此時中國政府還是怕列強干涉，不敢和俄國開始交涉。

繼優林之後而來北京的還有一位斐克思，……也未能和中國政府正式開始交涉。優林和斐克斯來華交涉失敗後，蘇俄政府駐英代表克拉辛，向中國駐英公使顧維鈞

商討中俄政府恢復邦交，並稱奉本國政府訓令，願以俄國與英德義瑞諸國所訂商約為標準，和中國訂立新約……此時外交部認為可以開始交涉。（「中俄外交史」第三三二頁）

俄國革命後，新疆與蘇聯最初的接近，就是訂立的一九二〇年的臨時通商協定，根據這協定，蘇聯到新疆的貨物，由無稅而變為納稅，從前的領事裁判權取消，這是最初平等條約，中蘇協定的先聲。其後，一九二四年的通商協定，只是根據前次而作較詳細明確的規定。（思慕：「中國邊疆問題講話」第二十九頁生活書店版）

加拉罕來華與中蘇北京協定

一九二三年一月，蘇聯政府復派加拉罕來中國，他一到北京，便受到朝野上下的歡迎，這原因是由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及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蘇聯兩次對華宣言，都是加拉罕署名的。中國人民對他的印象非常深刻而良好，所以他到北京不久，便能够排除列強的防害，而與我國開始交涉。（藍天照：「中蘇關係史略」光明版二八頁）

加拉罕到北京後，發表二「對華宣言」，述明俄國勞農政府對華之政策……俄國勞農革命推翻沙皇政府，本完全尊重他國主權及完全拋棄侵略所得之土地與財產之基礎

建設其對各國之新策。對中華之政策亦然，大中華民族具有其民族之文化及和平勤奮之精神，乃俄羅斯民族在亞洲最善之盟國。……帝國主義者欲化俄國爲半殖民地，俄國經營艱難困苦與掙扎，現已脫出危機。中國則實在掙扎之中，在其掙扎之途上，蘇俄實爲其唯一之友邦。……列強迫使中國四分五裂。內亂頻仍，成一不能抵抗侵凌之「病夫」。全世界中唯有蘇維埃共和國與俄國國民乃能以維護其利益與主權，唯有俄國由「病夫」恢復健康！挺然而起。（關於中俄交涉的重要公文及輿論「東方雜誌」二十一卷第八號）

當時北京政府在帝國主義操縱之下，對於中蘇談判，毫無誠意，中蘇交涉曾經多次波折。對於北京政府此種政策，全國人民一致反對，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各校學生並舉行示威，警告政府，各地輿論紛紛指出政府違反民意，頗易抨之態度，各種民衆團體均宣言反對政府仰承列強鼻息，促政府立即成立中蘇友善協定，如中華教育改進社等九團體宣言云：「國民所要的是立即無條件的承認蘇俄，成立親交的關係，共抗帝國主義。」指出北京政府不願訂立中蘇友好之協定真實原因，乃在於：「外力壓迫及當局私利之爭執。」該團體主張：「國民速起運動，用其勢力，以（一）反抗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外交之壓迫，（二）督促政府立即無條件承認蘇俄。」北京各大學教授正義宣言謂：

「俄國三次宣言，對我一反舊例之主義，而建立平等之原則，復於善人所求於列強而不可得之治外法權退還庚子賠款等，皆不待吾人之要求，而毅然撤消與拋棄。而政府却不能與此良友共同携手。」此爲我國操實權者辦理外交無獨立。」且云：「吾人誓以最短時間，俾中俄友好邦交之實現，而利吾國。」此外，北京各校學生均有類似之聲明與宣言發表。北京政府懾於民氣，延至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日，終於由內閣通過協定草案，開始兩國復交。（據東方雜誌二十一卷九號「關於中俄交涉的重要公文及輿論」）

中蘇「北京協定的要點如下：

- (一) 本協定簽定後兩國立即開始正常外交關係。
- (二) 兩國政府同意將以前帝俄時代所締結之一切公約、條約、協定及合同等項，擱行廢止，根據一九一九年與蘇聯政府宣言之精神，重訂協定。
- (三) 蘇聯政府根據其政策及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之宣言，聲明前俄帝國政府與第三者所訂立之一切條約協定等項，有妨礙中國主權及利益者，概屬無效。
- (四) 蘇聯承認外蒙爲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
- (五) 兩國政府互相擔保，不准有爲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組織。

(六) 蘇聯允許拋棄帝俄時代在中國的一切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租界及庚子賠款等項特權及特許。

這個協定完全本平等精神，中國政府把以前帝俄所侵略的損害，完全收回了。這個協定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開了新紀錄。(蘭天照：「中蘇關係史略」光明版「中國與蘇聯」三〇頁)

但是蘇聯雖然費了很大努力，與中國政府訂立了這個在近代中國是第一次平等的條約，中國政府仍未因此放棄其反蘇政策，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加拉罕向外部抗議：奉軍招用白俄軍隊，廣東陳炯明方面前對加拉罕抗議蘇俄助孫文參與粵戰。四月十二日俄使向外部質問，張宗昌部下白俄軍隊迄未解散，同月二十五日，加拉罕向外部抗議，東三省借日款築洮南、齊齊哈爾鐵路，妨礙中東路發展。因此種種問題，預定舉行之中俄會議，延至八月二十五日始舉行開會式。(據「中俄外交史」附編中俄外交關係大事年表)

對於孫中山先生與人民中的精神幫助與物質幫助

蘇聯革命的勝利，使國民黨進步份子不能不對國民黨過去的活動作重新的審定，不

能不去尋找革命的正確方向。一九二一年，召集了遠東被壓迫民族代表大會，在大會上，正確指出了遠東各弱小民族與殖民地革命正確的方針，當時國民黨亦曾派人參加，這一會議就開始推動國民黨向革命方向轉變。（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編「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

孫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是一九二二年八月越飛來到中國以後才具體進行的，一九二三年一月越飛因往日本養病，過上海時，與孫中山先生會晤，兩人談話結果，甚為融洽，於一月二十六日便聯合發表一篇宣言，聲述中蘇兩國的一般關係，以及蘇聯援助中國革命等事。越飛由上海赴日本時，孫先生派黎仲愷同往，他們二人在熱海同住，經過長期的密談，關於蘇聯實際援助中國革命的具體事項，及設立黃埔軍校等，曾有廣泛的決定。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蘇聯命鮑羅廷來廣東，廣東國民政府便正式聘請鮑氏為高等顧問，鮑氏由莫斯科帶來的使命約有兩大端：一為計劃黃埔軍校的創設；二為完成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工作。鮑氏運用其過去參與援助土耳其革命的經驗，很快的就把這二個任務實現了。於是中國革命在孫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及擁護工農利益這三大政策之下，革命勢力飛躍發展。（蘭天照：「中蘇關係史略」光明版「中國與蘇聯」三二頁）

練兵一事爲今日根本之圖，……汝爲（許崇智）果要一式之槍，可着之先整頓其部隊，汰劣留良，得一萬則可給予一萬，得二萬亦可給予二萬，因俄船已來過此地，以後再來，當更容易，如我確有可靠之兵，要槍使用，以後不成問題、此頭一批之械，不過到來一試耳，以後只要向我有人，必可源源接濟也。（孫中山致蔣介石函）

大元帥在開校前批發三百支粵造七九毛瑟給黃埔學校，但是當時兵工廠並不以我們學校爲重，只知道拍軍閥的馬，寥先生交涉了不少時日，開校時僅僅發下三十支，才勉強給衛兵守衛。開校後兩三個月，仍然石沉大海毫無影響。在一天下午，總理來了電諭說，蘇俄補充我們的槍械船快到了，叫我們預備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官長以至學生，無不興高彩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學生，喜得無地自容，拍手打掌說：今後革命有本錢了，眼望遠航船之到來日如望歲，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於是大家忙起來了，收拾儲藏的地方，保管點收的人員，俄國兵船官兵的招待，繩子檳子，真是忙的不亦樂乎。……我檢查了，一箱一箱叫他們登記了，長槍八千支，還有小手槍十支，這小手槍小得好玩，可以裝在洋服上邊小口袋裡。……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國式的步槍每槍有五百發子彈，是一個很大的數量，無不歡天喜地的說道：「今後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有的捨得飯都不要吃。這一次踴躍的情形，決非第二次第三次所能